



俄国史教程

(第三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24970

95232

K5/2.0
11

俄 国 史 教 程

第 三 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左少兴 徐天新
谢有实 张蓉初 合译

张蓉初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年 北京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АСТЬ III

Гос. изд.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г.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版译出

ÉGUÓSHĪ JIÀOCHÉNG

俄 国 史 教 程

第 三 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左少兴 徐天新 合译

谢有实 张蓉初

张蓉初 校

责任编辑 何渝生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392-5/K·286

1996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24千

印数 1009册

印张 13 3/4

定价：21.20元

目 录

第四十一讲	1
第四十二讲	26
第四十三讲	48
第四十四讲	66
第四十五讲	91
第四十六讲	111
第四十七讲	129
第四十八讲	148
第四十九讲	163
第五十讲	187
第五十一讲	213
第五十二讲	237
第五十三讲	255
第五十四讲	279
第五十五讲	296
第五十六讲	316
第五十七讲	332
第五十八讲	351
评述	364
注释	376
人名索引	411
地名索引	422

第四十一讲

5

对俄国历史第四时期的看法——这一时期的主要事实——这些事实的相互关系中明显暴露的矛盾——外交政策对国内生活的影响——第四时期的事件进程与这种影响的联系——国家和社会政治意识——动乱时期的开始——王朝的结束——沙皇费奥多尔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动乱的起因。僭位问题

第四时期¹ 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国历史上第四时期以前的时期。第四时期是我们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要研究的最后一个时期。我所指的第四时期是从十七世纪初起到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即位这一时期（1613—1855年）。可以把新王朝第一位沙皇登基那年作为这一时期的起点。僭位王的动乱时期是两个相邻时期之间的过渡时间，因为它与前一时期在其原因上有联系，而在其结果上又与后一时期相联系。

对我们来说，第四时期²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单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整整一个时代。在这整个时代中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这些事件构成我国生活中现代结构的深刻基础。的确，这个基础在瓦解，但还没有被取代。我再重复一句，这不是我国历史上的时期之一，而是我国一部完整的近代史。在这二百五十年内形成的种种概念和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与我们现在的思想意识有联系的早期思想萌芽，我们观察到曾经是我这样年龄的人对社会的最初印象的那些制度的开端。在研究这一时期的现象。

1

时，你会感到，愈往前走，你就愈加进入一个自传式的领域，愈加接近于研究你自己，研究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同我们祖国的过去是多么密切地联系着。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并在预防我们的思想为种种偏爱所左右。如果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成为真心实意的真理探求者，那么当我们想要衡量自己的历史发展和测定自己的社会成熟程度时，我们就不至于把自己弄得迷惑不解了²。

主要事实 现在我来列举这一时期的种种现象³；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已研究过的我国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简明扼要地想象一下这个历史的进程。我们已经知道，十六世纪结束之前，我国出现的政治生活形式是在与居民的地理分布情况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形成的。莫斯科国是俄罗斯居民建立的。俄罗斯居民聚居在东欧平原的中央部分，在这一平原的水文地理的枢纽地区，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在这里组成了大俄罗斯部落。在卡利达氏族统治下的莫斯科国内，大俄罗斯部落又联合成一个政治上的部族。莫斯科国君在莫斯科大贵族的协助下治理这个联合起来的大俄罗斯。这些大贵族来自古老的莫斯科大贵族氏族，来自过去的封邑王公及其大贵族。国家制度越来越坚决地过渡到赋税，在社会各阶级间强行摊派各种专门的国家赋役的基础之上。但是在这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曾经作为国家主要生产力的农民劳动，虽从法律上说仍然是自由的，但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已处于一种依附土地所有主的债务关系中，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使大部分人有降到合法农奴地位的危险。

在我国历史上，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一系列新的事件，正是这些事件使后一时期与前一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一个新王朝统治着莫斯科，其次，这个王朝的活动范围越来越扩大。在这以前，它只局限于大俄罗斯部落最初定居的

疆域之内，现在却远远越出这个范围，逐渐扩及整个俄罗斯平原，既扩大到这个平原的地理疆界，又几乎到处扩展到了有俄罗斯居民定居的边陲地区。小罗斯、白罗斯、最后还有新俄罗斯，都逐渐归入俄罗斯国家的版图。新俄罗斯是经过在南部罗斯草原殖民而形成的新的俄罗斯边区。国家的疆土从白海和波罗的海的海岸延伸到黑海和里海，扩展到乌拉尔山和高加索山脉以后，在南方又远远越过高加索山脉，在东方远达乌拉尔和里海之外。同时，国家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新兴的执政阶级形成了并同新王朝携手前进。旧的大贵族阶级逐渐解体，它的世系逐渐衰落，在经济上逐渐穷困。而随着这个阶级的消失，那些从前由于惯例而保持最高权力的政治关系也逐渐衰败下去。新兴阶级——服役贵族阶级——取代了原先的大贵族阶级而领导社会，服役贵族阶级是由过去的京官和各省服役人员组成，在这个阶级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夹杂着逐渐零落的昔日的大贵族。然而，过去奠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即在各阶级中征收赋税，逐渐固定下来，使社会各阶级变成一个个等级；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这个基础更加扩大，由于加在一些阶级身上的新的沉重负担而使得大量累积起来的专门赋役更趋复杂。在这种把人民的精力不断绷紧的状态中，农民劳动的自由也就彻底丧失；因为地主的农民逐渐沦为农奴，正是这种农奴地位逐渐变成加在这一阶级身上的新的专门的国家赋役。但是，人民的劳动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束缚，但在经济上却扩大了范围：过去是在农业上开发国家，而现在增加了对工业的开发；除了仍然是国家主要生产力的农业之外，在国民经济中，加工工业、制造工业的作用日益增长，它们使得直到那时尚未触动的国家自然财富得以发掘出来。

这些事实的相互关系 我们将研究的这一时期中表现出来的新的主要事实是：新王朝、国土新边界、以新执政阶级为首的新

8 社会制度、新国民经济结构。这些事实的相互关系可能使人感到困惑不解。在这些新的事实中，可以极容易地一眼看出两个平行的趋向：一)到十九世纪中叶，国家向外领土扩张与国内人民的自由发展呈反比；二)劳动阶级的政治地位同他们在经济上的劳动生产率也呈反比，即这种劳动的生产率愈高³，它的自由就愈少。第二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国民经济对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关系⁴，同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人民劳动的生产率和劳动自由有联系的观念是相矛盾的。我们习惯于认为，奴隶劳动不可能同自由劳动在力量上相等，如果劳动阶级的法律地位受到损害，劳动能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种经济上的矛盾还由于政治上的矛盾而日趋尖锐。在我们把各族人民的心理状态和个别人的生活加以对比时，习惯于认为：随着群众的活动(也正如个人活动一样)的加强，随着活动场所的扩大，群众中(也正如某些人中)会提高自身力量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政治自由感的源泉。

然而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国家领土的扩张给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施加的影响，并不证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因为随着我国疆土的扩大和人民对外力量的增长，人民的内部自由却越来越受到限制。人民的内部自由所处的紧张状态压抑了人民的力量；由征服而扩大了活动范围，政权的规模也扩大了，但是人民精神方面的上升力量却减弱了。新俄国的对外成就很像一只鸟在飞翔，旋风把它托起来，抛向天空，它凭借的并非自己两翼的力量。同上面谈到的两个矛盾都有联系的是第三个矛盾。我现在谈的是莫斯科大贵族阶级被服役贵族阶级吞没的情况。取消门第制的1682年法律确认了这一吞没，正式使两个服役阶级在服役方面处于平等地位。大贵族阶级(有门第的贵族集团)曾经是统治阶级。门第制的取消是管理民主化道路上的第一步。但这一运动的进程并不就此止步，因为继第一步之后接着而来的是第二步、第三步……。在彼得大帝时

代,旧的“出身世家”的莫斯科贵族阶级由社会各个阶层得到补充,甚至从外国人中,从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员(不仅有“白色”免税者,而且有“黑色”纳税者),甚至还由因功擢升的奴仆来补充:1722年官职等级表给这些“非贵族出身的人”敞开了进入“最好的上层贵族集团”的供职大门。本来可以预期,统治阶级的这一彻底的社会大换班将导致社会的民主平等。但是执政阶级虽然在家族世系上较卑微,可是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那些变得高贵的非贵族出身的人获得了旧的名门世袭大贵族阶级不曾有过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服役领地成了贵族的私人财产,农民成了他们的农奴;在彼得三世时期,取消了这一等级的强制性服役;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这一等级取得了拥有等级自治权的新的集团体制的地位,它可广泛参与地方管理和审判,有权向最高当局“呈递报告和申诉书”;在尼古拉一世时期,这一特权又扩大了,贵族会议有权向当局报告当地社会所有阶级的需求;在获得等级特权的同时,等级的政治力量也增长了。早在十七世纪,在这一等级取得这样一些成果的同时,莫斯科政府就开始依靠服役贵族来治理社会,而在十八世纪,这一贵族阶级却试图借助政府来管理社会了。贵族阶级原想在政治原则的幌子下来掌权,然而政治原则却按自己的方式走得很远:在十九世纪,贵族阶级是输送官吏的最有成果的基地,而到十九世纪中叶,管理俄国的既非贵族集团,又非民主派,而是官僚们,即一批在社会集团以外活动并失去一切社会面貌的各种不同出身的自然人^{4a},他们只是通过升官晋级才联结在一起。这样一来,伴随管理民主化进程而来的是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的加强^{4*}。由于统治阶级同被统治群众在道德上的异化,这种社会不平等就更为加剧。据说,文化会使人们接近,使社会平等。但是我国的情况不完全如此。同西欧日益频繁的交往给我国带来了各种思想、风气、知¹⁰识和文化,但是这股潮流从社会上层滑过,同时以多多少少谨小慎

微的、毫无效果的局部改革沉淀到底层。教育成了贵族老爷们的等级垄断物，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在未受教育之前触及这个垄断物，对于国家来说，不是没有危险的。十七世纪结束前，打算在莫斯科建立大学——我国第一所最高学府——的人们，认为大学的门可以向“任何官级、职位、年龄的人”无条件地敞开。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原来只负责改革任务的科楚别依伯爵秘密委员会，却就一件自杀案件（自杀者是一位学绘画的家仆）发表了果断的意见，认为让农奴身份的人进入“这样的学校”是有害的，因为“他们在这些学校里养成与他们的地位不相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理解的习惯”。

上述三个充满了这样一些矛盾的过程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全部重要现象^{5*}。这三个过程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历史规律性的否定，因此我们最好把它们叫做历史的自相矛盾，历史生活法则的例外现象，是各种条件的地方特殊风格的产物。但是，这种风格一经形成，在其未来的活动中就要服从人类生活的普遍规律，正如神经系统紊乱的机体按照有机生命的普遍规则起着作用，它只产生与其紊乱状态相适应的不正常现象^{5a}。

外交政策和国内生活 要解释我国近代历史的这些自相矛盾的现象，必须从国家的需求和人民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当一个欧洲国家面临新的艰巨任务时，它就在本国人民中间找寻新的手段，而且也常常找到这些手段，因为欧洲人民过着正常的按部就班的生活，自由地工作和思考，同时不需特别费力就把早已准备好的自己劳动和思想的丰硕成果贡献出来支援国家——这丰富的劳动产品表现为增多的赋税，丰硕的思想产品表

¹¹ 现为经过训练、能干和办事认真的国务活动家。整个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人民中，文化工作是由不受国家约束的单个人士和私人团体的不知不觉的，但却是协调一致的努力来进行的，而且往往赶在

国家需要的前面。在我国，问题正好相反。当沙皇米哈伊尔统治这个破烂不堪的王国时，他通过缙绅会议请求全国的帮助，他在拥立他为沙皇的缙绅会议的代表中有许多忠心耿耿和顺从的臣民，但在他们中间他却找不到合适的助手，也找不到富裕的纳税人。这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必须培养这两类人并获得培养人才的资金，如何在那些富有人才和钱财的地方既得到人才又搞到钱财⁵⁶？于是莫斯科的商人对政府谈到外国人的优点，因为这些外国人能把自己的工艺、技能教给贫穷的俄罗斯人，使他们得到“温饱”，挣得薪金。从那时候起，一个千篇一律的现象不只一次地反复出现。国家陷入日益艰难的困境之中；通常对这些困难毫无预见也无从预防的政府，开始在社会上寻找解救它的主张和人才，但是由于这两者都没有找到，不得已，政府才转向西方，因为它看到了西方培养各种人才和主张的古老而复杂的文化工具。于是沙皇政府匆忙从西方请来了会在我国搞出某种类似东西的工匠和学者，仓促修建工厂，开办学校，把学生塞进了学校。但是国家的需要是迫不及待的，等不到被塞进学校的学生把课本学完，它不得不（比如说）用原料，用破坏人民的衣食温饱和限制社会自由的强制性的牺牲来满足自己那种需要。国家的要求把人民的力量绷得紧紧的，没有提高它，而只是使它消耗殆尽，因为教育是依照官家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国内的需求，所以结出的果实是干瘪的、冻坏了的。而这种对教育的猝发性狂热在成长的几代人中间只产生了苦闷和对科学的反感，就像反感服民兵役那样。国民教育具有一种政府定货的性质或者官家按规定提供一些年青人接受训练的性质。开办了一些费用昂贵的贵族士官学校、工程学校、贵族女子和市民女子教育社团、艺术学院、古典中学，在一些贵族老爷家的温室里培植热带植¹²物，但是二百年内却没有开办过一所完全为人民的普通学校或农业学校⁵⁷。在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新的欧化的俄罗斯是一个近卫

军军营、政府办公厅和贵族老爷庄园的俄罗斯；贵族老爷庄园把自己的子弟通过在不太高明的学校或遥远外地的寄宿学校中轻轻松松的镀层金就送进近卫军军营或政府机关，然后当他们从这些地方出来时一个个都是穿上制服或礼服的退役军官或退職文官了。由于国家用这种方式从居民中培养所需的经纪人，所以它就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对科学抱粗鄙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看作升官发财的途径；与此同时，国家从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中培养出新的服役阶层——这个阶层在等级上和官职上的优越感和偏见，特别在服役时营私舞弊方面，与广大人民是格格不入的^{5r}。于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国家疆域的扩大搞得人力物力过分紧张，甚至消耗殆尽；国家政权加强了，但人民的自觉性并没有提高，一些新的比较民主的因素渗入管理机构，而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和分歧却尖锐化了；新的生产领域使国民经济的劳动复杂化，然而富裕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官家和某些企业主；与此同时，国家疆土的扩大使劳动阶级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和屈辱^{5s}。所有这些不公正的做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和人民的内部发展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关系。由于国家加速对外扩张，人民的力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落后于国家面临的^{5t}任务，人民的精神活动赶不上国家的物质活动^{5e}。国家膨胀了，而人民却瘦弱了^{5x 5°}。

事件的总进程 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国家的国际地位未必对其内部制度起更重要的影响，而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我们现在所论述的时期那样这种影响表现得如此明显。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十五——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及其产生，它们同我国过去命运的联系。我国历史的第一时期，在外部敌人的压力下，各个不同的部落和分散的居民好歹集结成某个整体，开始形成俄罗斯部族。第二时期，在鞑靼和立陶宛这两个外¹³敌加强打击的情况下，俄罗斯部族分成了两支，大俄罗斯和小俄罗

斯，而此后每一支都经历了自己的特殊发展过程。大俄罗斯一支在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并在同严酷的自然界和外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发展了这种力量。因此大俄罗斯一支能够结合成一个相当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国家。第三时期，把大俄罗斯统一起来的这个国家提出了恢复整个罗斯的政治统一和民族统一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和着手解决(仅仅是着手而已)曾经是莫斯科旧王朝历代君主的主要事业。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民为这项事业耗费的精力以及到十六世纪末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朝着这一目的努力的过程中，在莫斯科国内，社会已经习惯于那一沉重的政治组织(我们在上一时期中研究过这个组织)。十七世纪⁹，在动乱时期中损失某些领土之后，对外斗争就更为艰巨了，同时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同波兰和瑞典进行战争的重压之下，以往那些还保留某些特征(如劳动和迁徙自由)的具有独自的经济地位和不同官级的人，被合成为一些大的等级，而大部分农村居民则处于农奴地位。彼得一世时期，国家制度的主要发条被拧得紧紧的：按等级征收的专门赋税比十七世纪更重了。彼得在过去的等级负担之上再加上新的，比过去更沉重的负担——这就是服兵役和纳税。他把这些义务扩大到那些一直不承担国家负担的阶级身上，分摊到那些“自由人”和奴仆身上。这样就在立法上产生了一个共同赋役(如果不是所有等级的，那也是许多等级的赋役)的含混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预示着社会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在同一时期，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转变。迄今为止，国家在西部地区的战争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收复那些不久前被夺去的地方或者被认为自古以来就属于它的地方。从波尔塔瓦战役起，战争就具有了进攻性质，目的在于巩固彼¹⁴得为俄国在东欧取得的优势，或者像俄国外交家冠冕堂皇地说的那样，在于保持欧洲的均势。自从国家转上这条贪得无厌的道路

时起，就开始要人民付出比过去沉重几倍的代价。如果彼得没有大力提高俄国的生产力，人民是承担不了他们在欧洲不得不扮演的那种角色所付出的代价的。彼得大帝以后，国内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⁶。在这位改革者身后的那些不够格的男女继承人的统治下，王位开始动摇起来，于是那些继承者在社会上，首先在贵族中寻求支持。为报答这种支持，立法机关开始坚持不懈地主张推行一种专门等级法来代替彼得时期一闪而过的所有等级必须服役的主张。贵族得到了解放，免去了最沉重的强制性的服役，而且不仅保持了自己原有的权利，还获得了广泛的新权利。高级商贾也分得了一点儿这种实惠。这样一来，当局所能让出的全部好处和实惠都尽为社会上层所得，而社会下层只落得个沉重的负担和贫穷的生活。假如人民耐心地忍受了这样的制度，那么俄国就会脱离欧洲国家的行列。但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具有特殊性质的骚动。十七世纪曾充满了种种叛乱，当时它们的矛头都指向政府、大贵族、督军和官吏。现在这些叛乱则具有社会色彩，它矛头指向老爷们。普加乔夫起义是在合法旗帜下发动的，它具有合法政权反对叶卡捷林娜伙同贵族合谋进行篡权的思想。当大地在脚下颤抖的时候，根据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倡议，统治圈子里突然冒出了一种使社会平等和缓和农奴制的主张。人们愁眉苦脸，胆战心惊，反复咀嚼着同样一些计划，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把问题拖延下去，到十九世纪中叶，用缺乏毅力的改良意图（这种意图并不能为当局的赫赫尊号辩护）把事情搞到了这样的地步：解决这个问题已成为自发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冲击了停滞不前的社会意识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把第四时期事件的进程描述如下：随着对外防御性斗争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强，落在社会不同阶级身上的国家特种义务更复杂了；同时随着防御性斗争变成进攻性斗争，社会的上层

阶级就被免除它们所承担的特种义务，代之以等级特权，而义务也就统统落到了社会下层阶级身上；但是随着人民对这种不平等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增长，政府也就开始考虑对社会作出一种比较公正的安排。我们现在要极力记住上述提要，第四时期的重要意义和解释这一时期最重要现象的关键就在其中；这个提要将作为我们的一个公式——研究第四时期就在于揭示这个公式。

政治意识的提高 第四时期各种现象的排列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这个样子^{7*}。俄国社会中政治意识的提高，在这些现象中揭示的政治概念的变动，都同这一顺序紧密联系着^{7a}。到十六世纪末，莫斯科国家已走上正轨，国家生活的一般形式和统治工具已经具备：它有最高当局、立法机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日益增多的衙署官吏、愈来愈细的社会划分、军队，甚至还产生了有关人民代表制的模糊主张，只是国家的各种职责还不清楚，各机构本身只是形式而已。要使这些机构顺利开动起来，还必须要有内容，必须具备有助于各机构的人员透彻了解这些机构的意义和使命的观念，最后还必须具有指导这些机构活动的法规和风尚。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就具备的，而是要靠紧张的思想，通过艰辛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经验才能搞出来。当旧王朝逐渐衰亡时，莫斯科的国家机构已经具备；但是莫斯科的国家意识是否具备了？是否能够根据国家的任务和为了人民的福利在国家机构中展开活动呢？比如说，让我们对当时莫斯科人的政治意识作一个统计，并为此在这一意识上附上尽可能简单的国家定义，以便看看，根据国家的本质和任务，这些莫斯科人对国家制度的基本要素理解的程度如何。这些基本要素是：**最高当局、人民、法律和共同福利**。正如我们在第二十六讲谈到的，莫斯科国的最高当局在称号上和在一些传说中获得了几个拔高了的尊号；但这不是政治上的特权，多半是类似**全罗斯的君主**这样的庄严光环或外交赞誉。在日常生活和

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关系中，旧的封邑制准则仍占主导地位。这种准则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最高当局的实际基础。这种封邑制准则还在于：莫斯科君主的国家被认为是君主的世袭领地，是祖传的产业。僵硬的思维方式使事件进程带来的政治新概念屈服于这个习以为常的准则。莫斯科把大俄罗斯统一，这在社会意识中产生了人民的俄罗斯国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本质上虽然否定世袭领地制，但是它却以过去世袭领地的公式表现出来，因为这个公式不是使人把全罗斯的君主理解为罗斯人民的最高统治者，而是把他看作世袭的主人，是罗斯国土的土地拥有者。“自古以来，整个罗斯国土从朕之远祖起，乃朕之世袭领地”——伊凡三世就是这样强调的。政治上的思维活动落后于疆土扩展和王朝的野心，它把对封邑制的偏见变成政治上的误解；而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在这种反常现象的影响下，国家制度的其它因素变形了，因为这种反常现象把沙皇和世袭大贵族这两个不可调和的特性联结在最高当局这个实体中。照当时的理解，关于人民的思想还没有同关于国家的思想融合起来。国家不是看作由最高当局治理下的人民联盟，而是看成君主的产业，组成这个产业的是居住在君主世袭领地疆域内的各阶级居民连同他们的各项经济收益。因此，作为国家目标的人民的福利就服从于土地主人的王朝利益。而且法律本身也具有经济法令的性质，它是由莫斯科河畔克里姆林庄园颁布的，它规定下属管理机关(主要是地区管理机关)的活动办法，但尤其是规定居民履行各种国家义务的办法。直到十七世纪，我们在莫斯科的立法文件中，没有见到可以认为是确定最高当局的制度和权利以及规定国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法的法令¹⁷。因此，国家制度的基本因素同与这些因素的本质相适应的概念还不一致。国家结构的形式是由历史上人民生活的自发规律形成的，它们还来不及充实相应的内容就大大超过了以这些形式活动的人们已有的政治意

识。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观察在社会意识中人们所欠缺的构成政治制度灵魂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些概念又如何灌注到这些形式中，人们使之生机勃勃和哺育的国家躯干是如何逐渐变成国家机体的。到那时我所阐述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将失去其明显的不合理性，从而可以从历史上来获得解释^{7*}。

这些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一系列事实和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从新王朝在莫斯科统治时开始，来观察上面列举的新时期的种种事实。

动乱的开始 但是在新王朝统治之前，莫斯科国经历了一次动摇它最深厚基础的可怕的震撼^{8*}。这次大震撼首先并且令人痛苦地推动了新概念的传播，这些新概念就是那已消亡的旧王朝所不具备的国家制度。这次大震撼是在十七世纪初年发生的，在我国历史编纂学上名之曰**动乱**，或者照科托希欣的说法，叫做**动乱时期**^{9a}。经历过这一艰苦时期的俄罗斯人把这次震撼及其随后几年称之为“莫斯科国家的浩劫”。旧王朝最后一位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死后就立即显露出了动乱的征兆。至1613年初聚集在莫斯科的缙绅会议代表把新王朝的始祖米哈伊尔沙皇拥上王位时止，动乱才停下来。这就是说，在我国历史上可以把1598年到1613年这十四、五年称为动乱时期；当时特罗伊茨基-谢尔基耶夫寺院¹⁸主持（波兰人围困三一寺院的故事作者）奥拉米·巴里津也认为俄罗斯邦在这一时期是十四年年头的“大骚乱”^{8b}。在开始研究第四时期之前，先应该谈谈这次震撼的起因和意义。这次动乱，或者如当时外国人所形容的，这个“莫斯科悲剧”（tragoedia moscovitica），是从何而来的呢^{9a}。下面就是这一悲剧的情节。

王朝的终结 约在雷帝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死前两年多（1581年），在一个令人不快的时刻（当时像这样的时刻经常降临伊凡雷帝头上），他把自己的儿媳打了一顿。原因是这样的：她正怀着孕，